

试析畬族人口发展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

麻健敏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福建福州 350001)

摘要: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因素的综合反映。传统型民族繁荣是人多力量大,现代型民族繁荣则以现代经济、人口素质等为指针。从明清时期进入定居农业时代以后,畬族人口以不断扩大人口基数的线性上升方式展示民族的繁荣。21 世纪以来,畬族人口发展转向现代化演进,民族人口的结构得到优化,人口的质量有了极大改善,人口的寿命大大提高,全新的畬族人口发展趋势已经显现。

关键词:畬族; 民族人口; 人口素质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21(2013)02-0015-06

一、定居农业带来的畬民人口变化

明清时期,畬民离开长期生活的地域,大规模地向东迁移,最终形成了闽东、浙南交界区域畬族的主要生活区域。从此,畬族告别了原始游耕时代,开始了定居农业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不但给畬族带来经济生活上的安定,也推动了畬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进一步加深,进而为畬民族人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 定居经济带来畬族的稳定发展

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为了封锁占领台湾的郑成功,实行海禁,强迫沿海居民内迁 30 里,造成闽、浙沿海地区大面积的耕地抛荒。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平定台湾,方停止迁界令。复界之初,清政府鼓励开垦田土,免三年租税。优惠的政策和大片的荒地吸引了一部分先期居住闽东、浙南近海山区的畬民,使他们也加入到复界垦荒的行列。

乾隆初年,闽东各县地方官府对畬民先后实行编甲,畬民被编图册、隶户籍,编户纳粮,标志着他们正式告别了原始游耕时代,开始了定居农业的历史进程。乾隆后期(18 世纪后期),畬族入迁

闽东的历史基本结束。有学者推算,乾隆后期,闽东地区之内有畬民 4 万多人,其中福安县就有约 14000 人。光绪十年(1884)编修的《福安县志》记载“各都畬民村居”共有 209 个。浙江地方政府也出告示招募蓝、雷、钟等新畬民入境,在清代,浙江全省有 18 个县或多或少地有畬民在那里开山垦荒。闽东、浙南自古就是一个富庶而又充满温情的地方,畬族与当地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他们从汉族农民身上学到了许多农耕技术;他们从附近汉族社区引进锄头、犁耙、砍刀等铁制农具,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他们亲眼看到并且亲身体会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农耕生活的安定,于是不再留恋昔日的“游耕”方式,开始了择地定居、以农为业的尝试。

定居在闽东、浙南地区的畬民垦荒种山,种植禾稻、蓝靛、苎麻、甘薯、茶叶等农作物。畬民在自然条件艰苦的高寒山区开山辟田,种植适合在山上旱地生长的旱作禾稻,此稻因多为畬民所种,所以又被称作“畬稻”。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长乐华侨陈振龙父子从菲律宾引进甘薯(番薯)苗,畬民利用“火田”、“火地”种植薯类杂粮,薯类

收稿日期:2012-11-05

作者简介:麻健敏,男,广西平果人,壮族,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成为那个年代山区不可或缺的主粮。

畲族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是山地农耕经济的衍生。畲村最普遍的手工业是生产加工靛菁、苕麻和茶叶。明代,东南沿海纺织业发展,对靛菁的需求激增。“福建菁”名闻全国,有“福州西南,蓝甲天下”之说。闽东不少畲民开垦山地种菁,至清乾隆年间,闽东畲区靛菁生产加工进入最为繁盛的时期,“西乡几都菁客盈千”。由于气候和土质的原因,闽东和浙南广袤的山区成了苕麻的理想家园,山民都擅此业,种苕、制苕,直至织成苕布,形成生产“一条龙”。历史上闽东、浙南是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区之一,闽东、浙南广袤的山野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片的茶园。在畲村,几乎每家每户都种植茶树,茶叶给畲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

畲族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超人的吃苦耐劳,为闽东和浙南的山区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畲族经济文化生活的稳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 宗族文化对畲族人口的影响

清中期以后,畲族杂居在闽浙交界的汉族地区,新的畲族群落形成。畲族村寨多以血缘相近的同姓人聚合而居,这些同村同姓者一般均为同宗,即都隶属于村寨肇基祖的后代。单一家庭裂变为若干家庭,而若干家庭遂组合成统一家族,整个村寨便以单纯的家族血缘纽带维系着。

这一历史阶段的畲族社会已经与汉族社会形成交融的局面,汉文化思想渗透进畲族社区,宗族成为畲族社会组织的支柱,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以蓝、雷、钟三大畲族姓氏为核心的大宗族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畲族人口的变化,因为宗族强调的是兴盛,讲求的是人口的枝繁叶茂。因此,这一时期畲族族内婚的婚姻观念也发生松动,婚姻形式呈现多样化,畲汉之间的通婚日益增多,促进了畲族人口的逐步繁盛。

1. 族内婚的裂变

畲族社区构成的基本单位是一夫一妻制的以父系为核心的家庭。畲族传统的婚姻观念,一般不同外族尤其是汉族通婚,男子可以娶汉族女子为妻,畲族女子若嫁给汉人,则会受到家人与同族人的非议。畲族姓氏少,人丁也少,所以同姓远房的男女通婚很多。畲家传统的婚姻规制,一般是女嫁男家,由于通婚范围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其他的婚姻形式,比较典型的有

“嫁男”、“做两头家”。

所谓“嫁男”,即是男子“嫁”到女方去,俗称“当儿”或“喊儿”,女方要向男方送些聘金财礼。“嫁”到女方的男人,按传统族规改为女家姓,不可将子女带回;与妻子家的兄弟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女方家庭对其称谓不以“女婿”身份称呼,亲同己出,家庭地位和财产继承平等享受,不受任何歧视;有的畲村生儿子两家对分,长子从父姓,次子从母姓。婚后倘若他因故不愿在女家,允许出走,但走前须付双老赡养金。

“做两头家”也称“种两头田”。畲族男女共同上山下田,以“两头家”结成夫妻的不仅是独生子女,也有多子女的,特别是山区较为盛行。夫妻俩要种两家田地,赡养双方父母。这种婚事无需传统的结婚形式,也不办嫁妆,双方只要各办若干桌喜酒,两头都拜堂。“做两头家”所生子女分别从父母姓,一般长子随母姓,次子随父姓,长大后分住两家,分别继承两头财产。

此外,畲族地区曾经存在过服务婚、回头亲、对婚制、姑换嫂、童养媳等婚姻形式。如服务婚,有的畲家因男儿年少,家庭缺乏劳动力,以长女招婿担负田山劳作,被招者在岳家服务三年,以劳动抵聘金。三年后,可以携妻回家,婚礼仪式与“男嫁女家”相同。

畲族婚姻的自主、自由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据民国沈作乾的《括苍畲民调查记》记载,畲族“男女社交完全公开,其婚嫁之权,虽操诸父母,然不过名目而已,不干涉也”。山区的自然条件较为艰苦,畲族吃粗粮淡饭,穿苕布麻衣,住草寮木屋,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但在婚姻的选择上,男女青年若是双方情投意合,并不在意对方家庭富裕与否。

2. 强调家庭的抚养功能

畲民传统的家庭观念是以大家庭为荣,家庭规模较大。家庭中即使有多个子女,甚至是四、五代同堂也不轻易分家。畲族的这种大家庭喜好的形成,除了他们崇尚敬老、重亲情外,与大家庭在恶劣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下比小家庭有更强的抗力有关。

由于定居生活带来安定和稳定,清代以后畲族家庭户的类型和汉族逐渐相似,都是以核心家庭(以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两代户)为主,其比重最大,三代及以上户次之。畲谚云“娶一门媳妇,分一个家。”畲族男女婚后,便和父母分居,另立门户,独立生活。父母除与未娶亲的儿女

同住外,一般另起炉灶,自食其力。他们不与儿子儿媳同住是为了饮食自由,起居自由,可避免不必要的家庭纠纷。如果父母实在是老弱病残,力不从心,则由子女分担赡养,如采取吃派饭,或父母分开,各家侍候一人等等。然而,畲族家庭三代户比重还是高于汉族,反映了畲族大家庭较汉族比重更大,家庭抚养功能更强。

畲族妇女勤于劳作,与男子一样,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创造者,凡家庭的重大事宜,妇女有权过问,有时可直接参与决断。丈夫虐待妻子之事极少发生。当家的妇女,特别是大家庭中的老年妇女,家中巨细之事,她均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有的畲村女子有继承家产的权利。有兄弟的女子留家招婿,兄弟姐妹平等分配家产。过房到叔伯家和其他人家的女子,享有继承权,任何人无权干涉。妇女失偶,有权支配先夫的财产,还有招夫入赘的自主权,先夫家中的公婆叔伯无权干涉。

3. 生育观反映出对孩子的期盼

由于畲族居住分散,人丁稀少,畲族家庭对孩子十分的期盼。他们希望孩子顺利降生,对“带身人”(孕妇)呵护和照顾,不允许攀登高处和提过重的物件,以防止流产。畲族孕妇还有许多禁忌,如:家中不得动土、钉钉子和敲打墙壁,家里的任何物品孕妇不可去搬动;在外,忌讳从牛的缰绳上跨过,犯了忌讳,恐孕妇会难产或生下残疾婴儿。

婴儿降生后,给婴儿洗浴是十分讲究的。畲家人会用草药熬成的草汤来给婴儿洗澡,洗澡时,要先“开天门”,即洗双目,后“点龙鼻”,即洗鼻子,再“开龙嘴”,即洗嘴巴。待这些程序做好后,才可以正常进行洗浴。洗好后,男婴用生父旧衣服包裹,女婴用生母衣服包裹。

畲族民风古朴,对生男生女是一样看待的,不论男女,孩子出生后都要请亲友来喝“落地酒”。清代以后,随着游耕生活方式的结束,畲汉通婚的增多,汉族社会的生育观念开始渗透进畲族社区,男尊女卑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市场,一些女人开始裹脚,有了抱童养媳的习俗,甚至于一些地方出现了溺女婴的恶俗。

(三) 对畲民人口的早期关注

1929年夏天,德国人类学者哈·史图博和上海同济大学教师李化民到景宁畲乡考察,撰写了《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对景宁畲族的族称、姓氏、风土人情等作了详尽的介绍,是早期

畲族研究的重要著述,其中关于畲族人口方面的资料弥足珍贵。

在“身体特征和健康状况”部分,文中提到:敕木山畲民由于生活环境非常艰苦,人口繁殖不太快,儿童死亡率很高。一个妇女最多生七、八胎,然而有5个孩子的家庭是极个别的例外,大多数家庭没有这么多孩子。人们至多能养大两子两女。孩子一超过吃奶的年龄,父母给予他们的照顾就微乎其微了。六、七岁的孩子就得把他们的小弟弟或小妹背在身上(后者用布裹着捆在前者的背上)。

关于特殊的疾病,“我们未有所闻。老年人常患腰痛。这里最引人注意的疾病是在中国各地都蔓延较广的砂眼。这病由于缺乏合理的治疗,造成非常大的损害。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年纪较大的人)的视力因此大大降低。淋病据说是闻所未闻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有患梅毒的人。反之,肺结核似乎是存在的。”

史图博还记录了畲民的食物结构:以甘薯为主粮,一天仅食两餐,蔬菜和豆浆提供维生素和蛋白质,畲民有饮茶和饮自酿黄酒的习惯。关于人口寿命“畲民似乎很少活到高龄。在人口总数为270-280的敕木山村内,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娘和三个70多岁的老人。”

史图博对居住在浙江和福建的畲民人数,知道的还不够准确。他从上海出版的《时报》中摘录了当时浙江省政府编的关于畲民的分布与人数统计:景宁17400人;宣平4905人;龙泉3000人;遂昌6085人;松阳1136人;青田3000人;处州(丽水)6000人;平阳2600人。合计:44126人。在这个统计中没有泰顺、缙云、云和县的人口数据,他肯定这三个县也有畲民居住。

在民国时期,福建省有了首次官方的畲民人口的统计数据。1937年《福建省统计年鉴》载,福建“各县区苗夷民族概况”中畲族人口,其分布如下:连江874户3841人、宁德1600户4300人、三都30户343人、福鼎1250户5000人、福安2000户8400人、顺昌319户1499人、寿宁206户925人、长泰9户56人、宁化30户100人、南平90户248人、闽侯199户(缺)人、罗源1413户5552人。以上合计有8020户30264人。由于福建的漳州、龙岩等地区的畲族与汉族长期杂居,民族特征不是很明显,一直没有被外界视为“苗夷”,故而未进入到福建“各县区苗夷民族概况”的统计中。

由于闽浙地区集中了 70% 以上的畬族人口, 民国时期全国畬族人口的总数估算规模约在 10 - 15 万人之间。

二、民族重获新生以后的人口激增

历史上畬族不但一直没有正式的、能被畬族接受的族称, 甚至还被认为不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工作十分重视。1953 年, 由国家民委派出畬族民族识别调查小组, 分赴浙江景宁县、福建罗源县、漳平县进行畬族民族识别调查, 在确认身份后, 以尊重本民族意愿和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 1956 年由国务院正式公布确认, “畬族”就成为法定的族称, 从根本上结束了历史上族称混乱的现象。

1953 年, 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 由于畬族的民族成分尚未确定, 因此当时只是统计出福建省“山客”的人口数量: 96375 人。这一时期, 畬族人口开始呈平稳缓慢上升态势。如福建省畬族主要聚居地之一的霞浦县, 畬族人口从 1949 年的 20932 人, 增加到 1953 年的 21764 人, 增长 3.97%, 年均增长率 0.98%, 比 1937 ~ 1949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 0.14 个百分点。在浙江省景宁畬族自治县, 1953 年全县畬族人口比解放初净增 1710 人, 年均增长率达 4.50%, 而 1933 ~ 1949 年间, 畬族人口呈负增长状态, 年均增长率为 -1.22%。

(一) 两次人口发展高峰期的出现

1964 ~ 1990 年的 26 年间, 畬族人口的变化呈逐年上升趋势, 人口总量从 1964 年的 23.42 万人发展到 1990 年的 63.47 万人, 增长了近 3 倍, 人口增长率和年平均增长率均高于同期全国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其中的两次人口高峰期的出现尤其引人注目。

1964 年, 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 畬族有了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较为准确的人口数据——全国总计畬族有 23.4167 万人。以 1949 年全国畬族人口 10 万人为基数, 到 1964 年的 15 年间畬族净增人口 13 万多, 平均每年大约增加 8900 人, 年均增长率为 5.84% 左右, 出现了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

1990 年, 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全国畬族总人口 63.47 万人。这一时期畬族人口变动达到了第二个高峰, 从 1982 年的 371965 人增长到 1990 年的 634700 人, 年均以 6.90% 的速率增加。尤其是

江西和广东两省, 8 年间的年平均增长速率均在 30% 以上,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 倍强, 总人口分别从 1982 年的 0.74 万和 0.32 万猛增至 1990 年的 7.72 万和 2.65 万, 各增加了 10.4 倍和 8.3 倍。

(二) 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 畬族人口增长迅速, 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民族成分的“归本还原”

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不少畬民把自己填为苗族或其他民族成分。1956 年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确定畬族, 所以在 1964 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畬族和苗族及其他民族的人口数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畬族人口数量剧增, 其中很大部分是由于恢复畬族成分所致。如浙江省的畬族人口, 在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 仅有 5 万多人, 当时苗族人口近 3 万。在 1958 年 6 月复查时发现, 1953 年普查登记时的苗族人口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属于畬族, 所以在 1964 年第二次普查时, 两民族的人口数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动。畬族人口从 52676 人猛增到 1964 年的 100574 人, 增长率和年均增长率达 90.93% 和 6.05%, 成为浙江省畬族人口增长最快的 11 年。而同期的苗族人口从 28411 人锐减为 1964 年的 368 人, 这与民族成分的改变是分不开的。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政府制定了“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规定, 使许多原来隐瞒或填报了其他民族的畬族人口陆续重新申报了自己本民族的成分, 纷纷“归本还原”, 这是畬族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90 年福建省民族事物委员会统计, 福建全省有 7 万多人恢复畬族成分。福建省漳浦县“三普”时畬族人口只有 4000 人, 1984 年 7 月就有 17000 多蓝姓恢复为畬族成分。“三普”时广东畬族人口仅 3000 余人, 1990 年达到 26438 人, 其中大部分人口是由于恢复民族成分的结果。

1982 年和 1990 年两次全国人口统计中还出现了“离客归畬”的风潮, 也就是客家人改畬族的现象。长期以来, 当客家族群处于“强势文化”、“强势族群”之际, 处于相对弱势的畬族, 为了经济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 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 而在太平盛世, 文化的多元化和民族的多元化得到鼓励, 在这样的大气候下, 畬族民众提出确认民族的归属, 也就顺理成章了。漳州、龙岩地区出现的许多“离客归畬”现象, 正是对这段历史的

证明。

20 世纪 90 年代,贵州省有数万尚未进行民族成分认定的“东家人”归入畲族大家庭。贵州全省畲族人口据 1996 年统计,共有 41524 人,其中,麻江分布最多,有 32358 人。

2. 异族通婚增多

畲民族的居住地多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混杂一起,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民族隔阂的逐步消除,畲族一改过去不与其他民族通婚的族规,畲汉人民之间交往增多,通婚也逐渐增多。由于民族政策的作用,他们所生的子女绝大多数都填报为畲族成分。另据统计,1982~1990 年间全国畲族人口高速增长中,由于更改民族成分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畲族所引起的人口增长占 84.5%,选报畲族带来的自然增长占 15.5%。

3. 人口自然增长较快

由于经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物质文化条件的改善,畲民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不断增强。医疗卫生条件明显好转,各种传染性疾病和地方病得以有效控制,畲民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加强了对孕产妇的保健工作,死产、难产发生率大为降低,畲族人口出生率和妇女生育率均高于同期汉族人口的出生率和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长较快。

畲族妇女多为家庭妇女,文化程度低,从事田间或家务劳动,甚至是家庭主要劳力。她们居住在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妇女没有生育决策权,加上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的影响,早婚、早育、多产现象较多。1981 年对浙江云和县的已婚妇女调查,初婚年龄小于 18 岁的有 153 人,占总数的 18.75%;小于 20 岁的 536 人,占总数的 65.69%,平均初婚年龄为 21.33 岁。1982 年对浙江丽水地区畲族人口调查,15~19 岁的已婚畲族妇女占总已婚妇女的 13.59%。早婚必然带来早育,据浙江省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畲族 15~19 岁女性生育率为 16.16‰,比汉族高 8.91 个百分点。尽管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和深入,对早婚现象有所制约,但早婚毕竟成为畲族人口增长较快的一个新因素。

三、当代畲族人口发展的新趋势

2010 年第 6 次全国人口普查,畲族人口总数为 708651 人,增长率为 -0.01%。1949 年以来,畲族人口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当代畲族人口不论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优化人口构成,改善人

口素质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正朝着人口现代化方向演进。

(一)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福建、浙江地处沿海开放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快,随着产业经济发展、城市布局等的影响,畲族人口地区分布明显地呈现出人口从欠发达地区向相对发达地区迁移、流动的趋势。

2010 年,福建畲族总人口数为 365514 人,城市人口为 246449 人,乡村人口 119065 人,城乡人口比率为:1:0.48;浙江畲族总人口 166276 人,城市人口 107490 人,乡村人口 58786 人,城乡人口比率为:1:0.46。畲族的城市人口数量已经占据总数的一半以上,城镇化比例提高了 31.25%。

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还出现了一个人口流动的特别现象,常住人口近年来呈现减少的趋势。景宁县为了推动山区农民增收致富,历届县委、县政府都把劳务经济作为重要产业来抓,促使一批又一批勤劳勇敢、诚信聪明的畲乡农民走出大山,远赴全国各地,在异地他乡勤劳创业,闯出了一片属于景宁人的广阔天地。景宁县外出口从事较多的行业有超市、电站、宾馆等。外出人员在外地就业后通过亲带亲、邻带邻,在外买房、定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同时近年来景宁县高中及以上学生(含中专、大专、大学)在外地学习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大、中专学生毕业后,留在外地就业人数也在增加。此外,滩坑电站外迁移民(全县已移到县外 1.6 万人)也带动了外出人口的增加。

(二) 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畲族民族教育改变了以往落后的状况,得到较快的发展。由于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数众多、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教育取得了成效。

据 1949 年浙江省景宁县军管会统计资料,当时该县畲族人口中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仅 40 余人,文盲率高达 99.5%。丽水县 1 万多畲民,初小毕业生 400 人,高小毕业生 20 人,全县 98% 畲民是文盲。即使被认为是畲族文化最发达的福建省霞浦县白露坑,20 世纪 40 年代也只有 2 所私塾,能粗识字的只有 22 人,仅占当时当地畲族总人口的 2% 左右。

文盲、半文盲人数多少,所占比重的大小,是从另一个侧面度量人口教育水平的重要依据。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畲族 1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31878 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人口数为

126766 人,文盲率为 29.35%,其中男性文盲率为 16.81%,女性为 44.34%,女性远高于男性。2000 年畲族人口的文盲人口比率降为 11.81%;2010 年,更降至 6.28%。到 2010 年,畲族 6 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占 6.28%;小学 4.26%;初中 36.61%;高中 10.70%;大专 3.63%;本科 2.64%;研究生 0.16%。

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浪潮中,畲族山乡已经转型为外向型的经济,城乡畲族的经济生活有了质的提高。随着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害灭病工作的深入开展,地方病和传染病基本上得到控制。近年来,畲族乡村预防保健网逐渐健全,儿童计划免疫进一步普及,群众免疫力提高。加上全面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畲族人民看病难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畲族地区不断推进各项体育健身活动的开展,畲族青少年体质增强,体育人才增多,体育竞技水平得到提高。此外,一些传统体育,如棍术、拳术、投掷等项目,得到挖掘和整理,在一些畲族山村十分普及。

四、高人口寿命阶段的到来

回顾畲族人口平均寿命的历史,自从成为单一的民族以来,其寿命有了长足的进步。关于畲

族人口寿命的单独记载,由于资料缺乏,20 世纪 50 年代估算大约为 60 岁。通过对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推算,1981 年畲族人口的寿命为 67.13 岁;对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1989~1990 年畲族人口的平均寿命为 69.95 岁,可以说达到了 70 岁。不到 10 年畲族人口寿命增长了 3 岁,对畲族人口而言,“人生七十古来稀”已经成为历史,活到 70 也不稀奇了。

2010 年“六普”数据显示,畲族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继续在提高,达到历史上最高的 74.05 岁。一般说来,经济发达程度与人口死亡率成反比。畲族人口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相对于全国来说,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经济水平处在全国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死亡率的影响是直接和间接地发生作用。福建、浙江省畲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人口的死亡率排除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影响,则是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死亡水平的降低是毋庸置疑的。随着畲族经济的繁荣,畲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卫生条件日益改善,畲族地区的人口死亡水平必将进一步降低。

参考文献:

- [1] [德] 哈·史图博、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1984 年。
- [2] 沈作乾:《畲民调查记》,《东方杂志》21 卷第 7 号,1924 年。
- [3] 蓝炯熹:《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
- [4] 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 [5] 路遇、翟振武:《新中国人口 60 年》,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9 年。
- [6] 张天路等:《畲族人口的演进与发展趋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余 言]